

浅谈孔府旧藏文物中的儒家思想元素——以康熙青花瓷为例

杨晓达

孔府作为历代衍圣公的府邸,旧存文物种类繁多,主要有青铜器、瓷器、玉石器、金银器、书画、服饰、古籍档案等 20 多种类别,之所以能遗存下来如此众多的文物,与孔府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历代统治者多以尊孔崇儒为国策,不仅亲至曲阜礼瞻祭祀孔子,还御赐了大量祭祀礼器,帝后墨宝、文房清供、服饰等以示对孔子后裔的优待。据曲阜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统计,孔府旧藏清代青花瓷器数量有 1000 余件,其中,康熙青花瓷以胎釉精细、纹饰精美而负盛名,在实用与收藏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康熙青花呈色

康熙早期的青花发色遗留顺治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浓浓的渲染力度和用料的深浅程度相差不大,青料用色较厚,呈色偏深,蓝中带灰。而中晚期则相反,青花呈色青翠明艳、层次分明,有艳而不俗的特征,而且胎与釉结合紧密,釉色浑然一致,其翠蓝色调和多层次的渲染效果,浓淡有致,犹如水墨画一般,达到了青料与绘画技法完美结合的境界,对后世的青花瓷烧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康熙青花人物图盘(图 1),盘沿边绘四组如意形开光,内绘瓜果纹,开光之间隔以锦纹为地;盘中绘教子图,画面层次分明,人物绘画气韵生动,人物脸型较丰满,衣纹线条流畅清晰。此盘均匀工整,青花发色淡雅、沉稳,釉色莹润,纹饰绘画精细。教子图在清代大量应用于瓷器纹饰中,是典型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的以儒家思想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古代画师借生活用瓷宣传儒家思想的教化功用,传播传统家训文化,实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物化传播,在寓教于乐中进一步提高了产品销量,从而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家庭教育观念,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清康熙青花八蛮进宝图大碗(图 2),纹饰以“八蛮进宝图”为主题,所绘人物束身着靴,少数民族装扮,面部神情喜悦,憨态可掬,栩栩如生,手中各具奇珍异宝,依次进献宝物,呈现出当时异域各国来朝献宝的场景,人物身姿形态与周围的云、石、山形成一幅生动有趣的瓷上画面。此器造型规整,胎体坚硬,釉色光亮,青花发色灰蓝,纹饰布局疏朗有致,为康熙中晚期作品。“八蛮”是古代我国疆域以南的八个少数民族的统称,“八蛮进宝”题材常用来比喻疆土辽阔、万国来朝的兴旺景象,明、清瓷器常常绘此纹样,寓意国泰民安。从纹饰的布局和绘画特点来看,“八蛮进宝”的场面氛围“一团和气”、人物神态“宁静祥和”,而“和”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精神追求,《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亲善友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自古就蕴含着提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青花造型

康熙青花瓷器的造型变化多样,饱满有力,形体各部位的比例处理严谨,直线和弧线相结合,线脚交代清楚,转折变化不繁复。早期器型沿用明末的遗风,胎体较为厚重,中后期逐渐变轻变薄,胎质细腻,除盘、碗、杯、碟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大型的器物较为常见,如棒槌瓶、凤尾尊、观音瓶、花瓶、盖罐、钵缸、炉等器型。早期的花瓶器型粗壮,口大、颈粗、胫宽,中后期器型较早期相比显得秀美,颈下与器底明显收敛,腹部也比早期圆润。

清康熙青花云龙纹豆(图 3),口沿饰绉纹,腹部饰龙纹、祥云、火焰等纹饰,底部饰卷叶纹。龙纹形象还未脱离明代晚期的遗风,龙张牙舞爪,上下颚长,上颚凸起,如意形鼻,龙须向前起舞,但龙爪不像明代龙爪紧紧相靠,而是距离较大。此器胎体轻薄,釉面莹润,青花色泽略显灰暗;龙纹昂首缩颈,张爪怒目,龙鳞细密齐整且爪尖留白,极为劲健;胎质洁白莹润,与青花呈色交相辉映;外形轮廓曲线柔和,给人以优雅唯美的视觉感受,其青花呈色的精妙与龙纹的祥瑞完美融合。“龙”作为古代瓷器上的常用纹饰,一方面象征着权力和尊贵,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和秩序观念;另一方面与祥云或其他题材相结合,寓意着天下太平、吉祥如意,形成了“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文化现象。古代匠人通过具有吉祥寓意的龙纹,表达自己的期望和期待,同时也希望将这些美好的寓意传递给身边的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有序且充满幸福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儒家思想中“仁”与“和”的体现。

清康熙青花人物图花瓶(图 4),以人物故事图为主题,腹部饰折枝花卉纹。该器造型端庄古朴,线条变化丰富且构图严谨,主次分明,人物神情潇洒自如,形象清秀饱满,生动传神;整体所用三段式装饰手法,青花发色浓艳,山石、树木采用水墨晕染技法,层次感极佳,颇具时代特点。清代时期的花瓶被广泛用于文房摆设,与香炉等其他文房用品搭配,展现出文人雅士追求的精神境界和审美趣味,同时还常作为祭祀礼器,为“五供”之一。《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道出了对祭祀先人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把祭祀与孝道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祭祀不仅是对先人的怀念与敬仰,更是孝道的体现。而“孝”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基础,孔子主张通过行“孝道”从而推己爱人、孝亲敬亲,通过祭祀,可以缅怀先人,也可以传承和弘扬“孝道”精神。

康熙青花纹饰

康熙青花瓷器的纹饰对明末青花纹饰题材既有继承又有改进,同时又有新的创新,题材以花鸟、山水、人物、吉祥图案等为主题的居多。早期纹饰遗留明末遗风,豪放、精细并存,中后期纹饰布局疏朗有致,笔法细腻,多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人物故事、花鸟树木等题材,有浓郁的民间色彩。绘画技法上采用了分水法,绘工精细,渲染浓淡相宜,层次分明;盛行书写整篇诗文辞赋,以书法作为辅助装饰;山水图效仿宋、元、明以来的传统水墨画的构图特点,在勾好的轮廓线内,用不同浓度的青料进行渲染,突破了传统平涂的单色调,使得青花层次分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水墨画的效果,给人以远山近水、景物深远、幽静之中又极有诗意之感。

清康熙青花麒麟纹大盘(图 5),盘面绘麒麟、芭蕉、火焰、山石、花草等纹饰。此盘形制端庄,胎体细腻,釉面莹润,青花发色青蓝,纹饰布局疏朗有致。麒麟为康熙早期勾廓露白的典型绘画技法,呈半蹲回首状,造型硕大,怒目扬鬃,张口露齿,满饰鳞纹,生动传神,基本形成了龙头、鹿身、马蹄、龙鳞的形象,通常与蕉叶、山石等纹饰组合在一起。麒麟在中国传统民俗礼仪中有祈福的寓意,《名山藏》载:“孔子将生,有麒麟吐玉书于阙里,圣母以绣绂系麟之角。”传说孔子的母亲在身怀孔子时,遇到麒麟口吐玉书于阙里(今山东曲阜),孔子家人感觉这是一种祥瑞,并将一彩绣系在麒麟的角上以示谢意。因此,流传下了孔子的出生有“麟吐玉书”和“麒麟送子”的说法,此器作为孔府旧藏文物之一,与《名山藏》记载遥相呼应,充分体现麒麟作为“仁兽”与儒家文化的深度融合。

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图碗(图 6),口沿内绘如意形开光,内绘八宝纹,开光之间隔以锦纹为地,外壁绘山水人物图。此器胎质细密,釉色莹润,青花发色青翠,纹饰布局疏朗,采用先勾线、后罩青、加分水渲染法进行填色,通过调整青料与水的比例,将青花发色调出五种色阶,使得青花发色层次分明,纹饰更加和谐生动,为康熙青花纹饰的典型特点之一。整幅画面中山峦叠嶂、群峰竞秀,流水潺潺,人物形象生动,体现出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画中弥散着渔夫丰收之后和谐安逸的生活气息,不仅表达了人民追求安居乐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且印证了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

古代匠人深受儒家“尽善尽美”“致中和”思想影响,其艺术作品既要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要求和伦理道德,同时尊师重教、精益求精、知行合一的精神也在工匠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不仅体现在其思想境界和技艺水平上,还深深影响着文化的传承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孔府作为孔子嫡系后裔的府邸,所藏文物记录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研究儒家思想在清代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有着重要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

江西万安县博物馆“青山遮不住——万安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一块《新建云兴书院碑记》成为众多展陈文物中的焦点。石碑为青石质长方形,通高 177 厘米,宽 72 厘米,厚 4.0 厘米,重 100 千克,碑体虽有裂缝残缺,但周边卷草纹雕刻十分立体精美,文字完整清晰可见,碑头“□□云兴书院碑记”为篆体,碑文共五百余字,均为楷体,落款时间为“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仲冬月长至日记”。碑文详细记载了清代江西万安县两所书院的起源、变迁、兴废过程和确切地理位置,以工程纪事文的形式记录了云兴书院的重建过程。此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较高的文物研究价值,是万安县唯一一块记载书院的碑刻,为万安县博物馆藏珍贵文物。石碑全文如下:

新建云兴书院碑记

邑书院二:一曰濂溪,始为濂溪祠,祀周子。继改龙潭书院,旋仍额濂溪;一曰云兴,始为白云寺,寺废改建书院。朱子过之,题曰“云兴书社”,明时为书院,兴废修葺,邑志详载言之矣。

云兴在北郭外,久废仅存基址。濂溪在县署西,近市,苦嚣尘。嘉庆己卯以后岁假。

文昌宫为讲习所,苦隘湿不能容多士。封取廖君,名诱,字玉山,号堂亭,乃捐金鸠工,于文昌宫右侧创屋三重:外为门,前为厅,中为讲堂,后为燕寝。左右书舍各八间,厨房三间,仍朱子“云兴”之额,志向往也。

院有兴废,学无古今。学圣人者,舍朱子之学,无所为学。入书院者,舍朱子白鹿洞学规,无所为学也。经始壬寅年八月,落成癸卯年十月,计费约两千金上,复捐钱两千串,存典生息,以助增取肄业生童膏火。落成,适于调补邑篆,贡生刘永基,廪生何振卫、刘国林、朱述祖等,呈其事,属余为文以记之。窃为敬初,学兴贤育才,有司事也,有司所未能为,缙绅为之,则冷比其邻嘉惠后进之意也……

为培植一邑人才之事,夫子所云“富而好礼”“已欲达而达人”者,廖君,其庶几乎!行将以其行义呈大吏,请朝廷表厥宅里,为乐善者勤,并望肄业院中者,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以切体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复其恒性,叙其彝伦,共相勉于,处为醇儒,出为纯臣,则多士为善必果之心,与廖君乐善不倦之心,必有相得而彰影者。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仲冬月长至日记

署万安县事建昌府广昌县知县文

山曹士桂

文中首先道出万安两座知名书院的源流,其一为濂溪书院,最初是祭祀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号濂溪)的祠堂,后来改为龙潭书院,但最终仍恢复“濂溪书院”之名,院址位于县衙西边,靠近集市,环境嘈杂。在嘉庆己卯年后,每年定期对其进行修缮;其二为云兴书院,最

西厢风月入珐琅——河北博物院藏民国铜胎画珐琅《西厢记》盘

李立华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时期,新旧文化、中西思潮在此激烈碰撞。铜胎画珐琅作为传统宫廷工艺的代表,在民国时期逐渐走向民间,并与通俗文学题材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以《西厢记》故事为装饰主题的珐琅盘,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隐喻,成为研究民国工艺史与社会文化的重要样本。

河北博物院举办的“华彩珍蓝——河北珐琅艺术展”中,展出民国铜胎画珐琅《西厢记》盘两件。两盘均为方形,倭角。盘内壁满绘粉色小朵花卉,四壁中心椭圆形开光绘卷草纹,内地开光绘《西厢记》戏曲故事。盘外壁及底施白釉,四壁绘蓝色龙纹,盘底以淡粉、淡绿、淡蓝等色绘蝙蝠寿桃纹饰。铜胎画珐琅《西厢记》盘不仅见证了民国时期工艺美术的转型,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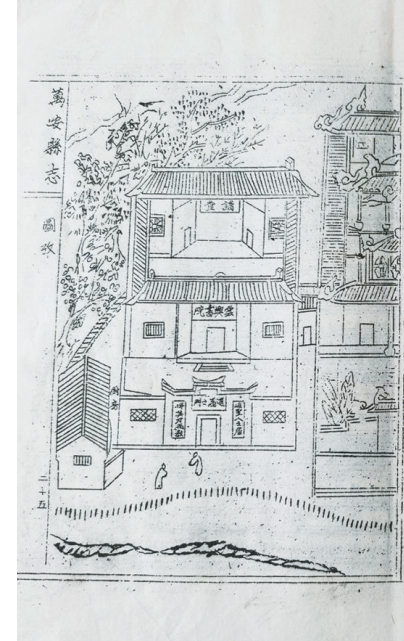
乱世中的工艺涅槃

铜胎画珐琅又叫作画珐琅,清朝康熙年间由欧洲传入中国。画珐琅大多是用紫铜做铜胎,表面用白釉铺底色,然后用彩釉描绘珐琅图案,再经过焙烧、镀金而成,体轻、明亮且绚丽多彩,这种工艺在清中期达到顶峰。至民国,随着宫廷匠人流散,工艺技术传入民间作坊,然而,受限

初是白云寺,寺庙废弃后建为书院。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路过到此讲学,并提名为“云兴书社”,明朝更名为“云兴书院”,历经兴废修复,县志对此有详细记载。院址在县城北的城墙外,道光年间已荒废,仅存基址。

从碑文中可知,文昌宫为云兴书院讲席所,苦于空间狭小简陋,难以容纳众多人才,于是地方乡绅廖诱发起并捐资,在文昌宫的右侧重修云兴书院,工程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八月,落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十月,历时一年两个月。书院落成之时,地方绅士请当时万安代任知县曹士桂撰文,落款“署万安县事建昌府广昌县知县文山曹士桂”记录了撰文人的身份、姓名、籍贯。曹士桂,时为建昌府广昌县知县,文山指他的家乡。撰写时间为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全文虽有寥寥五百余字,但历史文化信息非常丰富,从书院建设的背景、发起者、捐资者、建筑规模布局、经费来源、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翔实记录。“学圣人者,舍朱子之学,无所为学。入书院者,舍朱子白鹿洞学规,无所为学也。”表明了书院以朱熹的学说为根本指导思想,重建云兴书院并沿用其名,将当时尊崇理学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文中反映了清代中期地方书院面临的选址不当、空间不足、经费短缺等问题,并提出乡绅捐资、利用金融生息等解决办法,记录了清代书院经费筹措的一种重要方式,将大额本金存入典当行获取利息作为书院运行的长期稳定收入来源,体现了地方教育中“官督绅办”的建院模式和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末清晰说明了书院教育的核心目标不仅是知识传授,培养“处为醇儒,出为纯臣”的德才兼备之人,更要践行儒家伦理,维护伦常有序。尤其是乡绅通过捐资兴学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并寻求官方认可,体现了



清同治十二年《万安县志》文昌宫及云兴书院图

西厢风月入珐琅——河北博物院藏民国铜胎画珐琅《西厢记》盘

李立华



铜胎画珐琅西厢记人物故事盘

于战乱频发与工业化冲击,珐琅器的制作趋于简化;胎体由厚重的紫铜转为廉价的黄铜,釉料配方因进口原料短缺而掺入本土矿物,导致色彩饱和度降低。这种“去宫廷化”的工艺转型,既降低生产成本以适应市民市场需求,也折射出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

民国初年,珐琅作坊在动荡时局中艰难求生,据工匠王金发日记记载:“时局虽乱,求购洋珐琅料者反增,盖富室欲藏器避祸也。”这种矛盾现象催生了传统工艺的变异发展,铜胎画珐琅器在实用功能消退后,反而成为文化寄托的载体。民国匠人改进了掐丝工艺,首创“隐丝法”,将传统景泰蓝的金属丝轮廓转化为珐琅彩绘中的墨线勾勒,这种技法的革新,在河北博物院所藏铜胎画珐琅《西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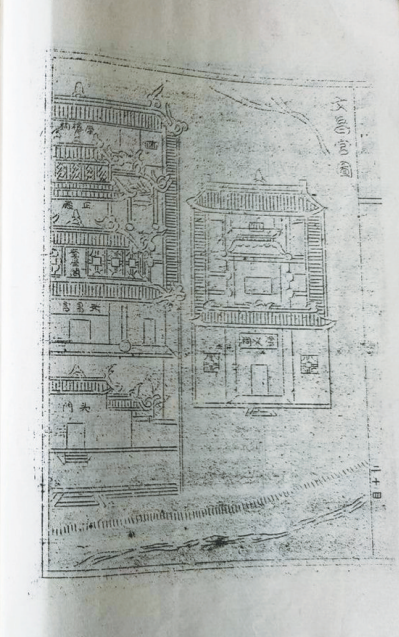
一种社会责任和对乡绅乐善好施义行的推广和赞扬。

碑刻作为历史文物重要类别之一,其记载的文字信息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其书法和镌刻艺术具有时代特征和研究价值。“新建云兴书院碑记”不仅是万安县历史文脉的重要物证,更是一份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珍贵文献,是研究万安县乃至清代江西地方教育、社会、文化历史的第一手不可替代的实物史料。其历史价值在于为研究清代地方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建筑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提供了详细依据,也是清代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在地方教育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明证,从书院的命名和学规遵循中反映了朱熹在清代地方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是朱熹在江西活动足迹的珍贵物证,更是地方文化记忆的宝贵实物见证。

(作者单位:万安县博物馆)



万安县博物馆展厅碑刻陈列



铜胎画珐琅西厢记人物故事盘

西厢风月入珐琅——河北博物院藏民国铜胎画珐琅《西厢记》盘

李立华



铜胎画珐琅西厢记人物故事盘

记》盘上得到完美体现,人物富有动感的衣襟线条,完全依靠不同色阶的珐琅料堆叠呈现,彻底摆脱了金属丝的束缚。另外,西洋化学颜料的引入也带来了色谱革命。民国珐琅彩料品种从清代的 28 种激增增至 53 种,特别是玫瑰红、钴蓝等新色的运用,使得画面层次较清代器物丰富三倍以上。这两件画珐琅盘中,无论人物衣裳、山石草木还是家具陈设、建筑装饰,其微妙的色彩表现是传统矿物颜料难以企及的。其中,仅人物服装就有果绿、鹅黄、皮粉、湖蓝、米驼、淡紫等多种颜色。另外,从“月下联吟”盘上张生身后太湖石深浅浓浓的色彩变化,又可见当时一些珐琅工匠已开始尝试将写实光影技法融入传统工笔画,通过明暗对比渲染山石的立体感。

(下转 7 版)